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节目



午间1小时

绝对现场(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节目

午间一小时

绝对现场（二）

总策划：邹新炎 杜嗣琨

主 编：万 梅 原 杰

执行主编：高 岩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午间一小时绝对现场 (二) /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
节目部编著. -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02

ISBN7-80112-406-5

I. 午 … II. 中… III. 广播节目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1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6024 号

责任编辑	赵振兰
封面设计	伊和轩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电 话	(010) 65523123 65523819
社 址	北京市朝外大街吉祥里 208 号
邮 编	100020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6.5
字 数	398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112-406-5/G·168
全 价	29.8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序 言

广播与时俱进，中央电台在正午黄金时段推出了一档以社会热点为主要关注内容的大型谈话节目，使国家电台的节目播出史上又多了一个花色品种，老百姓又多了一个收听的热点和参与的渠道。

2001年的365张日历在不知不觉中伴着“365个轮回，365个话题”随风而散，当《午间一小时》谈话节目的播出稿应众多听众的要求结集出版的时候，编辑部里似乎没有那应该与之俱来的收获的喜悦，编辑、主持人仍然在忙碌着：寻找选题、策划文案、联系嘉宾、落实演播室……而我，作为他们的业务领导、一个目睹了他们艰难创业、辛勤耕耘的老编辑，却思绪良多。

蓦然回首，一年多前创办节目的情景就在眼前。那也是上次节目改革，中央台领导提出，要在中午的黄金时间开办一档有听众围观式参与的嘉宾访谈大型谈话节目，任务落实给一班年轻人。这类节目中央电台以往没办过，自然没有现成的样板可依，一天一个社会话题，每日不同的现场嘉宾，还要“议论风生”，还要“欢声笑语”，想想就知道难度之大。可再难节目也要办，而且要办好。他们走出去、请进来，大会、小会、诸葛亮会开了一箩筐。节目构想有了，策划出来了，节目终于开始做试版。那些日子，午间节目部的灯总是熄得很晚很晚。中央台业务大楼的四、五、八、十一、十四各层录音间都能见到他们不知疲倦的身影。说是不知疲倦，可内中甘苦有谁知呢？节目部主任万梅有句话道出了鲜为人知的滋味，她说：“这个团队的每个人都有‘可

歌可泣’的故事”。我这里想引用她年终述职报告中的一段话：“节目开播前后大概有两个多月，我们印象中几乎就没在晚上十点以前下过班。我们也许这辈子都会记得，合成完第一期节目已是一个世纪的最后一小时了，走出大楼，准备拥抱新千年的街头张灯结彩，披红挂绿，而我和几位同事还饥肠辘辘，我们在寒风中接连跑了几家餐馆都因为太晚了而被拒之门外……”但是，他们终于凭着对事业的执著和背水一战的勇气挺过了最初那段艰难的日子。

2001年1月1日，新世纪第一天的正午12点，崭新的节目在一首叫做《开门红》的歌曲中与全国听众见面了。辛苦了两个月的编辑们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回音。第一个电话在节目结束曲还没有播完时就打了进来，听筒那头是国防大学的乔松楼教授，话语间掩饰不住的是这位中央台的老听众对这档新节目的喜爱和期待。

节目真就一炮打响，来了个“开门红”。2001年7月，中央台委托权威调查机构对全国听众收听情况做了一次大规模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刚刚诞生半年多的《午间一小时》节目在这次调查中听众收听率和满意度都属上乘，被评价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黄金节目”，在专题类节目中名列第一。

他们是靠什么成功的？首要一条是坚持正确导向，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此同时，还须照顾到不同层次听众的收听需求。一年来，编辑们在选题上可谓煞费苦心。谈国计民生，深刻但无空泛说教；话人间冷暖，平实而不媚俗取宠。用一位听众的话说，《午间一小时》给人一种“心贴得很近的感觉”，使人在轻松愉快或真情感人之中得到有益的启迪。您翻开这本书，随便看看目录就应该能感受到编辑们所下的功夫。那些林林总总的选题几乎囊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哪一个不是老百姓关心的、经历的？常言道，“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话题和老百姓贴

近了，又是一种平实、自然的交流方式，听众当然爱听。像“餐桌上的污染”，“打工者维权热线”、“女性该不该早退休”、“关注老年再婚”、“谁来圆残疾孩子的工作梦”等等，还有他们精心策划的几组系列广播谈话节目，如探讨社会公德系列《叩问心灵》；高考志愿选择观念引导系列《走近名校名家》；六·一儿童节系列《为了孩子，为了明天》；探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百姓关系的一组节目《WTO——中国对接世界》；《午间一小时》年终回访系列《祝福你，朋友》等等等等，无一不是紧扣现实生活的脉搏适时推出的“重头戏”，透着《午间一小时》编播人员对时代律动的敏感和拳拳的社会责任心。

一些节目播出后社会反响强烈，一些具体问题通过这一节目得到了解决：20岁的农村姑娘郑金瑛，因相依为命的母亲患乳腺癌做手术急需两万元钱，便通过一家报纸宣布：“谁能帮我妈治病，我就嫁给谁。”《午间一小时》在节目中对此事进行了探讨。节目播出后，收到了大量听众来信，有表示同情和安慰的，有慷慨解囊的，有为姑娘提供工作机会的，不少听众贡献出自己搜集的治病秘方。远在太平洋彼岸加拿大的一家制药集团的员工，通过《午间一小时》登在新浪网的节目稿件了解到郑金瑛母女的情况后，立即发E-mail与编辑部取得联系，并无偿为郑母提供了这家制药集团研制的高科技抗癌生物制品。一场广播谈话打动了千万听众的心，也改变了一个农村姑娘的观念和她的命运。在母亲的手术成功后，姑娘也在好心人的帮助下靠打工有了自己的收入。

身患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的西安考生苑鸣高考得了571分的高分，却没有大学肯录取他。《午间一小时》的主持人紧急赶赴西安制作了一期节目，向听众传递了一个顽强地与病魔做斗争的少年内心的渴望，呼吁在现行的高考体检标准面前高校能够给他一个机会，在《午间一小时》节目组及其他媒体的持续关注下最

终使苑鸣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北京大学毕业生殷永纯自愿到安徽贫困地区做了一名不拿报酬的山村教师，实现了自己为贫困孩子编织梦想的美好愿望。但贫困地区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办学方式？《午间一小时》在节目中就此进行了探讨。节目播出后，引起当地教育部门的重视。一个月后，殷永纯任教的学校取得了正式的办学资格，并成立了由海内外热心人士组成的“学校筹委会”，确立了由社会各界捐助开办公益学校的原则。不少大学生通过《午间一小时》与该校取得了联系，其中一些大学生成了这所学校的志愿者。

.....

广播为各方人士架起了一座了解社会、关爱你我的空中桥梁，通过这本书，也许您对节目之外《午间一小时》的编辑和主持人们也多了一分了解。我想，您如果跟我一样了解《午间一小时》这群年轻人对生活的热爱、对社会的责任，您如果跟我一样了解他们的智慧和才年，您可以期待，不久的将来，又一批新话题、又一部新书稿将呈现在您的面前。

杜嗣琨

2002年4月2日

目 录

再现历史.....	(1)
独行千山，孤身单骑走中国	(14)
为孩子打造明天的希望和梦想	(26)
让我给你一个家	(38)
朋友	(49)
让意外伤害远离孩子	(62)
不该污染的学术净土	(72)
一个出逃女童的故事	(83)
院长爸爸的幸福	(96)
苑鸣的大学梦.....	(109)
临终关怀.....	(124)
家庭医生向我们走来.....	(136)
生命的童话.....	(151)
民警老蒿的故事.....	(163)
病毒、黑客.....	(173)
穿越无人区.....	(189)
爱心助学喜与忧.....	(203)
深山里的烛光.....	(215)
体检标准，该不该成为高等学校难以跨越的门槛.....	(227)
生命因你而精彩.....	(238)
助学贷款开启大学梦.....	(255)
历史不应该忘记.....	(268)

救助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279)
我是文楼村的朋友	(291)
沉甸甸的父爱	(305)
性教育走进军营	(316)
贫困孩子走进豫剧之家	(328)
网络警察	(337)
生命的渴望	(349)
编外警察	(361)
关爱走失老人，全社会的责任	(373)
你是我生命中的奇迹	(388)
记者的责任	(405)
在爱心中成长	(423)
旅行者	(434)
点亮西部明天的希望	(452)
打工青年陈明钰和他的打工维权热线	(464)
王丽娟和她的特殊学校	(477)
盲人女孩的积极人生	(490)
千千，你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500)

再现历史

播出日期：2001年6月28日

嘉 宾：陈 晋 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主 持 人：朱 煦

节目编辑：高 岩

编辑首语：

陈 晋：1958年出生，幼时曾随当铁道兵的父母辗转全国各地，文革期间在湖北插队，1977年，作为全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3年至198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文学硕士，1987年开始，进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从文学创作转入史学研究，他的著作《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毛泽东与文艺传统》、《毛泽东之魂》、《文人毛泽东》等在学术界独树一帜。1993年，陈晋第一次主持创作大型文献纪录片《毛泽东》，在电视界开了文献专题片的先河，此后他一发而不可收，先后担任了《邓小平》、《周恩来》、《新中国》、《毛泽东在浙江》、《毛泽东与湖南》、《使命》等大型文献纪录片的总撰稿。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学者，一个很特殊的电视工作者，他在以非常人性化的方式再现着新中国的历史。本次节目是对陈晋的一次个人访谈，但是我们从中也看到一个生动的伟人形象，看到一段不平凡的历史。

意味深长的细节

朱 煦：有人说陈晋先生是在以一种非常生动的形式向老百姓讲述一个政党的历史，一个国家的历史。我看《使命》第五集的时候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第一个镜头是江泽民总书记到青藏视察，他接见部队的领导干部，你们只选用了总书记的一小段话，他说“请前排的老同志坐下，这样我讲话就能够更安心一些了”，我就想问一下，作为总撰稿，您为什么选了这样一段总书记的讲话作为这一集的开始。

陈 晋：这一集的主题是反映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这样一个主题我们可以从一个非常小的基层组织起笔，但是考虑到片子要有气势，要有宏观的概念，所以就要同时反映最上层和最下层。我们在写稿的过程中还画了一张时间表，记录了江泽民总书记从1989年6月到1990年1月半年的时间里到过的地方。一看就知道，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是非常关注基层的，那么这个立意就找到了。但光找到立意还不够，还要有一个很形象生动的画面，在这一集的开头有这样一句话：“在辽阔的蓝天下面是更加辽阔的土地”，这一句解说词不是没有含意的，土地更坚实，它就象征着党的基层组织，对支撑祖国的蓝天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总书记乘飞机到了青藏高原，他下去了，下到了基层去了。刚才你提到那个镜头，就是这次考察中的一个细节。另外还有一些细节我们没用，比如他在云南视察一个武警边防支队，他挨个儿跟战士握手，当和一位旗手握手的时候，我们在同期声里听得很清楚，总书记说“这样，我来帮你握这个旗杆，你把你的手腾出来，我们好好握个手。”

朱 煦：非常生动。

陈 晋：很感人。这些话实际是一种精神上的对接，一种心

灵的沟通。

朱 煦：亲切亲密。

陈 晋：对。

寻找历史

朱 煦：做这种大片，容量都是非常有限的，你们是怎样从这么多资料、素材、线索中选出一个个典型的事例的呢？

陈 晋：文献记录片的创作和文学创作不一样，文学创作我们可以在家里构思、冥想，自己想像，但是文献纪录片的创作就不同了，我们在动笔之前要找很多资料。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在创作《毛泽东》的时候，为了把画面搞得更生动一些，就调看了很多有关毛泽东的记录片，在看到毛泽东晚年接见基辛格的一个画面的时候（因为当时的电影没有声音，只有画面），我们从画面上看毛泽东跟基辛格握完手以后再去和基辛格的夫人握手，基辛格夫人的个子比基辛格还高，毛泽东的个儿在中国人里算高的了，可是基辛格的夫人比毛泽东还高，所以毛泽东就感到很惊讶，这时候我们在画面里看到毛泽东像个很顽皮的孩子，很天真的孩子，仰着头看着基辛格的夫人，指指她，又转过头跟基辛格说了句什么，笑了笑。他到底说了什么？我们觉得这里面肯定有戏。可是当时的电影没有记录下声音，怎么办？于是我们就开始查，先翻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档案，档案里有文字记录，但是记录的是会谈的时候的。直觉让我们觉得这里肯定有故事，怎么办呢？正好基辛格当年到上海参加国际会议，我们马上决定采访，采访他的时候就特意问了这个细节，说“您带着您的夫人第一次见毛主席的时候，毛泽东看到您的夫人，跟您说了什么？”他很快就反应过来，他说“我记得非常清楚，毛泽东跟我夫人握手的时候需要抬着头看我的夫人，他很吃惊，转过来对我说，



‘和一个比你高这么多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你有什么感受?’”你想，这个时候，通过基辛格把这段历史回忆出来，一个非常真实的伟人的形象一下子就出来了，情绪化、很幽默，我们在做这段片子的时候把对基辛格的采访和当时的电影穿插起来用，这时候观众看起来就很有意思了。

真实是文献片的生命

朱 煦：我想这样的故事一定是很多很多的，正是您的这种敏锐，发现了这样的细节，使我们很多的普通人通过片子看到毛主席被还原的一面。您在做《邓小平》、《周恩来》这些片子的时候，这是不是一直是你们创作的指导思想？

陈 晋：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挖细节。电视文献纪录片有一个定位的问题，最根本的生命在哪儿？在真实，还原历史。用什么还原？像历史剧，是用想像，情节来还原，电视文献记录片靠什么还原？靠资料，包括文字资料、音像资料；靠遗址，遗迹；再就是靠当事人的回忆。通过调动这样的手段，然后通过主观的研究组合起来，再现历史。有好多记者采访我，“你的片子里讲的事是不是都是真的？”我说“我可以用人格担保，不是所有真实的我们都能够在片子里展示出来，但是我们展示出来的肯定就是真的，这是一个起码的职业规范，也是我们文献记录片所追求的一个最高点。我举个例子，在做《周恩来》的时候，我们采访了周恩来身边的很多工作人员，其中有一个工作人员说周恩来病危的时候，叶剑英元帅去医院看他，吩咐医务工作者 24 小时值班，而且还拿一叠纸放在总理的床头，说一旦他醒来了（因为他经常处于昏迷状态），有什么话要说在场的人员一定要原字原句地记录下来，但是一直到总理去世，叶剑英交的那叠纸依然是原封不动的放在那儿，也就是

说即使他醒来了也没有说什么。作为文学化的东西，这样的回忆多感人啊！周恩来在那种恶劣的政治环境当中，在病危的时候，他也没把他想说的话说出来，带着很多遗憾，也带着一段历史，带着一个人的感情走了。但是后来我们采访别的工作人员，他说“总理去世前我一直在总理旁边，我不记得叶帅拿过一叠纸让我们记，我不记得有这个细节。”如果是一个文学创作，前面那个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文献记录片为了尊重历史，哪怕有一个同样时空条件下的见证人说“没有这个事”，那么别人说得再生动我们也不能用。

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历史

朱 煦：人们总在讲文献片是在真实地记录生活，可是我却觉得文献片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它不是机械地去写实。您所撰稿的文献片，从1993年的《毛泽东》到现在的《使命》，给我的感觉就是从来没有机械地写实。

陈 晋：这就涉及到文献记录片另外一个问题。还原历史是一个基本要求，但是我们任何一个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历史发生过以后就无法还原。

朱 煦：只能是尽可能的。

陈 晋：对，即使“还原”这两个字本身也不是纯客观的。同一段历史你去还原或者我去还原就会很不一样。这就涉及到我们主观上对历史的理解和把握。我们毕竟是站在20世纪90年代或者站在21世纪说20世纪的事，肯定有我们今天的视野，今天的眼光，肯定有我们主观上要表达的愿望。

朱 煦：就是说我们想告诉人们什么。

陈 晋：对，像《周恩来》这部片子，总理最深入人心的一点，就是他是“人民的好总理”，同时好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好人。



如果说我们要告诉大家周恩来是好人，这是一个还原的方式，他有好多好人好事，可以展示的细节很多。但是我们如果要告诉人们周恩来不仅仅是好人，还是一个好的总理，一个好人未必可以当总理，但总理是好人，这个历史含量就不一样了。还原本身还有一个含义，就是纠正一些错误的概念。好多历史上的细节由于偶然的讹传就传下来了，如果没有一个对历史负责的精神，还是延用这个去说，可能就比较麻烦。举个简单的例子，毛泽东平生最得意的一幅照片是斯诺给他照的，戴着红军八角帽。

朱 煦：在陕北。

陈 晋：好多人把它用在长征，包括现在的遵义会议纪念馆，毛泽东的这张照片就挂在那儿，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大家都知道，斯诺是1936年10月在陕北的保安采访毛泽东的，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召开，那时候还不可能有这张照片。我们就要有意识地把这个事实更正过来。但是既然通过时间的考证认为它不是那个时候照的，那它是在什么情况下照的呢？这时候文献记录片的价值就显现出来了。

朱 煦：我觉得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要让一般的人能够很静下心来看这样的片子，让这样一部文献记录片家喻户晓，片子本身一定要有一股抓力、吸引力，否则大家也知道现在电视频道那么多，五花八门的东西都在里头，观众很容易就会转移了。

陈 晋：我想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怎么理解人，刚才我说到理解周恩来，那么怎么理解毛泽东呢？比如毛泽东肯定是个军事家，这是没问题的，他打了那么多仗，而且把红军、人民解放军从弱到强带出来了。那么作为军事家，毛泽东和别的军事家有什么不一样？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视野，这是要有研究眼光的。《毛泽东》这部片子专门有一集就叫《胸中百万兵》，写毛泽东的军事生涯的，如果说这一集从头到尾，把毛泽东一生打了什么仗，一个一个罗列起来，肯定是枯燥无味的，因为没有作者自己

的认识在里头，没有今天的视野在里头。怎么办？我们自己找，毛泽东作为军事家，他的特点在哪里？我们通过细节，发现什么呢？他作为一个军事家不喜欢摸枪。你说世界上哪一个军事家不是从战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而且哪个军事家没受过伤？毛泽东就没有。更奇怪的是他作为领兵打仗的人，我们从史料中包括一些回忆里面发现他一生只有很短的时间跨过枪，就是在井冈山的时候。那时候他是“委员”，“毛委员”，委员是个党内职务，后来因为他在井冈山打游击，当时的中央不认可，批评他，说他右倾，这样就把他的党内职务撤消了。结果交通委员到井冈山传达的时候把这个信息传达错了，传达成了“中央撤消了毛泽东的党籍”。你想一个不是共产党的人怎么能当委员呢？怎么办？这个部队又是他带出来的，最后给他安排一个师长，这时候他才开始背枪，而且当师长那天讲话，他就把枪又放下了，他就是这么一个军事家。后来我们就抓住一点，毛泽东是用笔打仗，用毛笔，他不是用枪打仗。有一句解说词是这样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毛泽东说的，但是说出这个名言的人恰恰不喜欢摸枪，因为枪固然可以创造胜利、辉煌，但是它也创造死亡，而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面，羽扇纶巾的诸葛亮要比驰骋战场的许诸高出许多。”而毛泽东恰恰是靠他的智慧来用兵如神，这就是他作为一个军事家的特点。再比如 1955 年评军衔的时候，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应该仿照苏联的模式，因为苏联给斯大林评的是大元帅，在中国能够配得上大元帅的人也就只有毛泽东了，当时天津的一个工厂把大元帅服都做好了，但是毛泽东开玩笑说“那东西我穿着不舒服”，实际上他就不接受，他不在乎“大元帅”这种称号，所以这套大元帅服现在还保留着。在片子的结尾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情景，打完三大战役，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帮他梳头发，发现了一根白发，他让李银桥帮他扯下来，李银桥把白发扯下来交给他，毛泽东捻着那根白发说了一句，“打了三大战役，



白了一根头发，值得”。这就是军事家，超凡的军事家。

朱 煦：大气。

陈 晋：对，这种性格，这种魅力，这种军事统帅的方略，和一般人就不一样，这就是我们用今天的视角还原出来的毛泽东作为军事家的特殊性。

在还原历史的时候如何找到今天的定位

朱 煦：您刚才一再强调今天的角度和今天的视野，我想今天的年轻人都非常讲究自我实现，讲究个性化的发展，他们很在意从别人身上发现个性的魅力。陈晋，你是学者，刚才你也说自己是电视工作者，那么你在做这一系列片子的时候，是怎么把握今天的老百姓对这些人的感情的呢？

陈 晋：这就涉及到我们做还原历史的文献记录片的时候怎么找到今天的定位。电视是做给观众看的，你的主题再高，你要宣传的思想再好，老百姓不爱看你就白做了，我想这是每一个作者都不愿意面临的情况。所以事实上我们在做每一个片子的时候都有一个论证，论证这个片子做给谁看。一个简单的事实，文献记录片，无论做得多好都比不上《还珠格格》。

朱 煦：您的比方也差得太远了，这两个不能搁在一块儿。

陈 晋：这是从收视率来说的。说实话，现在观众看电视几分钟、几秒钟可能会换一个频道，这完全是可能的，起码一两分钟两三分钟没有一个精彩的段子或者亮点他肯定要换台，这是对做文献记录片最大的考验。

朱 煦：这是一种新的考验，二三十年前，信息相对比较贫乏的时候，这个问题也不称其为问题。

陈 晋：对，因为你看也是它，不看也是它，反正要看。

朱 煦：现在就不一样了。